

楊維真著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楊維真著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楊維真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3

面； 公分. --(史學叢刊； 24)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5-0584-6 (精裝). ISBN 957-15-0585-4 (平裝)

1. 唐繼堯—傳記 2. 中國—歷史—民國1—15年
(1912—1926)

782.883

82009680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全一冊)

著作人：楊維真
出版社：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印 刷 所：臺灣學生書局
印 刷 廠：臺灣學生書局
記本證書局登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00號

印 刷 所：臺灣學生書局
印 刷 廠：臺灣學生書局
地 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號
電 話：(02) 23456789
地 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43巷5號
電 話：(02) 23456789
地 址：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樓
電 話：(02) 23456789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初版
定價精裝新臺幣二六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

62822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584-6 (精裝)

ISBN 957-15-0585-4 (平裝)

自序

在民國政治史上，雲南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地區，這是因為滇省僻處西南，中央勢力很難深入，故而相較於其他省份，雲南得以維持較獨立自主的狀態；這從雲南先後幾位主政者如唐繼堯、龍雲、盧漢等人的作為中即可看出。另一方面，由於滇軍武力乃南中之強，尤其在民國十六年以前，亦即唐繼堯統治時期，滇軍曾數度出兵鄰省，爭衡天下，成為影響西南政局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此雲南的態度與立場往往能左右西南政局之發展。而在近代雲南歷史上，唐繼堯無疑地佔據了極為重要之地位。唐氏曾主滇十四載（民國二年—十六年），雲南人士最引以為傲的護國軍起義基本上是在唐領導下起事的（筆者當然不否認還有其他助因，詳內文），此刻唐繼堯與雲南之聲望一時如日中天。但在護國之役後，由於滇軍不斷向外擴張，時人對唐氏即已毀多於譽，甚且詆其抱持「大雲南主義」，欲做「西南王」。其後又因唐氏與孫中山的幾度分分合合，國民黨人士乃責其未能與孫真誠合作，只是一懷抱地盤私念的軍閥而已。對於這一極具爭議性之人物，實有詳加探討之必要。筆者之所以選擇唐繼堯做為研究的專題，除了其極富爭議的作為外，更希望透過對唐氏的探索，以究明民初西南政局發展之脈絡，而為日後整個西南史事之研究能有更堅實的基礎。

本書自撰寫至出版期間，承蒙恩師林能士教授悉心指導，舉凡架構之安排及史料的取

捨，乃至於文字的潤色與謬誤之糾正，都使筆者獲益匪淺。尤其在審閱原稿時，林師更是花費許多時間和心力，逐字逐句批閱，乃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這些年來，不論在學業上或生活上，林師不斷地給予我鼓勵與關懷，謹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忱。蔣永敬教授、李守孔教授、胡春惠教授的指點與啟發，亦使筆者深受其益。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所遭遇最大的困擾莫過於史料的不足。臺灣地區所擁有唐繼堯的資料相當少，這方面幸得雲南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謝本書教授慨允相助，惠寄大批相關資料，乃使筆者對唐繼堯的研究終能順利告成，謹致以萬分謝意。此外，對於許多朋友的協助，只有致上衷心的謝忱。本書獲中國歷史學會評選為「中國史學研究論文叢刊」之一，並承學生書局惠允出版，謹一併誌謝。

本書未能對唐氏治下的雲南內政多所著墨，誠為筆者最大缺憾，蓋如此則無以見唐繼堯治理雲南之全貌。當撰寫本書之初，筆者原擬於第五章第二節「響應聯省自治」中詳述唐氏治滇成績，唯因相關資料太少，只有暫且擱下，以俟來日。故而此節的份量較其他章節短少甚多。筆者才疏學淺，力有未逮，錯漏之處自是難免，尚祈各方先進不吝賜正。

最後，謹將本書敬獻給我的父母親，感謝多年以來父母親對我的養育、教導之恩。

楊維真 序於臺北外雙溪

民國八十二年三月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目 錄

自

序

I

緒

論

一

第一章 出身與崛起

九

第一節 從昆明到東京

九

第二節 辛亥革命前後

一八

第二章 北伐與督黔

四五

第一節 辛亥前後的貴州政局

四五

第二節 北伐入黔

五八

第三節 出任貴州都督

六八

第三章 護國討袁

第一節 移師督滇	八三
第二節 護國討袁之醞釀	九四
第三節 護國軍起義	一一一

第四章 靖國護法

第一節 「大雲南主義」的興起	二八
----------------	----

第二節 靖國之役	四九
第三節 出亡經緯	六九

第五章 回滇與覆亡

第一節 二次回滇	一七七
第二節 響應聯省自治	一八八
第三節 挣扎與沒落	一九一

結論

徵引書目	一一〇九
序言	一一〇三

緒論

民國成立以後，在袁世凱當政時期曾有過短暫的統一，但這局面不久就隨著袁氏的去世而告結束。隨後大小軍閥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他們擁有自己的武力，佔據若干地盤，並且在他們勢力所及的地區實行個人專制的直接軍事統治①。一般而言，這些軍閥大致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性：一、養兵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個人以及本軍的利益；二、以武力做為解決爭端的正常途徑；三、軍事權不受行政權的約束；四、忽視國內甚至國際的秩序和法律②。他們形

① 通常一般史家以隱含貶損之意的「軍閥」一詞來稱謂這些軍人，但這個稱謂有時卻失之籠統、武斷，因為這些軍人在許多方面都呈現出不同的發展；但無論如何，「軍閥」一詞仍是各類著作中引用最廣的。因此爲方便解釋，本文仍襲用「軍閥」一詞（間或用「軍系」）來稱謂這些軍人。

李新「北洋軍閥的興亡」，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代序，頁一；又見李新「軍閥論」，史學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頁九一。這三個軍閥的特徵簡言之，即「私軍」、「地盤」、「武治」，一般史家對前二者多表同意，但對第三點則有意見，認爲軍閥中亦有人行「文治」者，見來新夏「略論民國軍閥史的研究」，上海學術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頁四一。

②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三版，頁一七三。

成了若干的派系，派系之間常因利益一致而結盟，但也可能隨時因利益衝突而分裂。他們大抵保持一種均勢，若有一派勢力過大，其他各派則聯合起來對抗^③，這也是軍閥時期戰爭不斷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從民國五年護國之役後，一直到十七年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止，這段時期史家稱之為「軍閥統治時期」，全國無論南北，均籠罩在軍閥的統治下，形成中國現代史上一種很特殊的現象。

有關軍閥的研究，長久以來一直未曾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其造成的原因雖多，最重要的是軍閥及其身處的時代，在歷史上的意義未完全被人了解的緣故，所以軍閥史的研究一直未能開展，也因此成為學術界尚待耕耘的範疇之一。這種現象一直到一九六六年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出版其書《馮玉祥傳》（*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後^④，情勢才有了改觀。此後二十年，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軍閥的論著不斷問世，軍閥時期的歷史也愈來愈受到史家的注意。近年來關於中國軍閥的研究，逐漸有由大軍閥轉向中小軍閥，由單一軍閥轉向軍閥群（軍系），甚至由人物轉向區域研究的趨勢。其中關於西南軍閥史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美國史學界在這方面已有若干成績出現^⑤。而大陸史學界近十年來也興起西南軍閥史研究的風氣。這是由於中共為了修撰中華民國史，因而各種官私檔案、史料文獻陸續整理公佈，加上西南各省地方史研究的興盛，遂使大陸史學界在這方面亦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⑥。臺灣史學界研究軍閥史，由於起步較晚，尙多偏重於北洋人物的探討，對於西南軍閥史研究，僅有零星幾篇論文，嚴謹而有系統的論著並不多見^⑦。尤其對於西南軍閥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滇系領袖唐繼堯，迄今尙無人對其作有系統的研

究。

做為滇軍軍系之領袖，唐繼堯的一生實有許多足堪評述者。唐繼堯出身詩書世家，曾獲舊

- (3) 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7.
- (4)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eh-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5) 如凱普(Robert A. Kapp)對四川軍人的研究 (*Szechu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拉莉(Diana Lary)對桂系的探討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及蘇堂棟(Donald S. Sutton)對滇軍的探討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等。

(6) 大陸史學界近年來頗致力於西南軍閥史研究，除相關各省組成研究小組，撰寫各省軍閥史外，更於每年召開一次西南軍閥史學術討論會，會後並集結論文出版研究叢刊，以做為編著《西南軍閥史》的準備工作。截至一九八九年為止，討論會已召開六次，研究叢刊出版四輯（其中第四輯、第六輯尚未出版），《貴州軍閥史》及《西南軍閥史》第一卷亦已付梓，代表大陸史學界對西南軍閥史研究的初步成果。

(7) 除了早期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兩篇關於湘系人物的碩士論文：蘇燈基的「趙恆惕與湖南自治」（民國六十一年）及劉鵬佛的「譚延闕與民初政局」（民國六十八年）外，僅有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陳曼玲的「陳炯明與粵軍」（民國七十二年），以及黃益謙的「陸榮廷與廣西」（民國七十五年）。

功名；後來留學日本土官學校，接受新式軍事教育，並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工作；返國後復領導發動雲南辛亥革命，與清軍作殊死戰，這些背景和經歷使唐氏與其他北方軍閥有著顯著的不同。唐繼堯在三十歲時出任雲南都督，此後掌理滇政長達十四年，並且在護國、護法諸役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唐氏由一地方實力派一躍而為全國性的人物。在民初西南政局中，唐繼堯曾一度居於主導的地位。護國之役後，唐氏不斷擴充實力，除控制滇省外，並屢次出兵川黔，意圖囊括西南半壁江山，隱然成爲西南的盟主；但終因連年用兵，實力耗損，而伏下敗亡之機。唐繼堯一生環扣著整個西南局勢的發展，而其功名事業又恰與軍閥時期相始終，故其於民初軍閥政治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很值得做爲個案研究。

在研究唐繼堯的過程中，有若干問題值得思量。唐繼堯早年的背景（包括家世、就學、留日、參與革命）對其日後行事有何影響？袁世凱執政時期，唐的政治立場如何？護國時期唐繼堯的態度與作爲又是如何？何謂「大雲南主義」？唐氏向外擴張的原因及用意爲何？他在護國之役後，由地方實力派一躍而爲全國性人物，這種身份轉變對其心態有何影響？在西南政局中唐扮演何種角色？唐繼堯與孫中山的幾次分分合合，其原因安在？唐氏何以敗亡？在民初的軍閥政治中，唐繼堯應歸屬於那一類型的政治人物？這些都是本文所欲處理的重點。

中外學者對於軍閥史的研究，無論是探討個別的軍閥人物或是研究整體的軍政運作，已有不少的專書論述，但對於唐繼堯的研究尚不多見。大陸學者謝本書著有《唐繼堯評傳》一書，全文分十二章，論述唐氏一生事蹟^⑧。謝氏乃大陸史學界中研究西南軍閥史的著名學者，

發表專書論文甚多，《唐繼堯評傳》是其個人若干年來的研究成果，也是對於唐繼堯較為完整的記載。對本文而言，此書引用資料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但是其結構並不嚴謹，而且多少受制於意識型態，立論難免偏頗。另外，美國學者蘇堂棟（Donald S. Sutton）著有《地方軍事主義與民國——一九〇五年至二十五年的滇軍》（*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25*）一書，全書共分十一章，主要是透過對滇軍的探討，分析滇軍的興起、成長、茁壯、分裂，最後則以駐粵滇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做為結束。此書雖然偏重於滇軍的發展，但由於唐繼堯乃滇軍領袖，二者仍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尤其此書最後三章分別敘述滇軍在四川的發展，駐粵滇軍分裂與入川滇軍倒戈回滇，以及楊希閔部滇軍與國民黨的交往，都和唐繼堯有或深或淺的關係，對於本文仍有相當的助益。此書優點在於理論系統的建構，透過運用「地方軍事主義」（*Provincial Militarism*）此一觀念來分析滇軍領袖的形成與變質，這是此書相當精彩的部份；但因作者以滇軍為主軸，且後來則偏重於駐粵滇軍的發展，加以成書較早，引用資料不夠週全，所以在論述滇系領袖時，常受制於早期學者的一些錯誤記載⑨。因此在本文撰寫過程中，除了極力蒐集各種相關資料，

⑧ 謝本書，唐繼堯評傳，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

⑨ 蘇堂棟在論述護國之役時，由於多是引用梁啓超及其門生的相關記載，以致於遇事揚蔡（鍔）抑唐（繼堯），甚且謂護國之役乃蔡等人發動，唐根本無心反袁，已經扭曲了史實真相。當日唐氏反袁的態度，可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加以爬梳查證外，並且儘量以客觀的立場從各個角度去探索問題，落筆務求審慎。尤其對於上述二書未注重的部份，特別是唐氏與西南政局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作一番探討，以期對民初西南政局的變遷，能有更清楚的認識與了解。

本文的架構以人爲經，以事爲緯。換言之，即以唐繼堯作一主軸，環扣各個時期的西南史事，透過對唐氏生平的探討，以尋求民初西南政局發展之脈絡，並說明唐繼堯與西南政局的互動關係。全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五章，第一章「出身與崛起」，敘述唐氏的早年經歷，留日生涯，以及參與革命、發動昆明重九起義的經過。第二章「北伐與督黔」，說明黔省內閩始末，唐氏督黔原因，以及督黔的若干作為。第三章「護國討袁」，探討唐繼堯繼任滇督的因由，雲南發動護國之役的底蘊，並對唐氏反袁作一客觀之平議。第四章「靖國護法」，分析雲南對外擴張的背景，西南各省衝突的因素，唐繼堯對護法的態度，以及唐氏出亡之經緯。第五章「回滇與覆亡」，說明唐繼堯二次回滇的經過，探討「建國」時期唐的政治主張，最後則分析倒唐政變的前因後果。

本文主要徵引資料爲唐繼堯遺留的若干文電，包括《會澤督黔文牘》、《會澤首義文牘》、《會澤靖國文牘》另佐以各類專著、論文，並且大量運用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的文史資料選輯，以及全國文史資料選輯、近代史資料中的相關記載。此外，雲南省檔案館出版有《雲南檔案史料》期刊，係以檔案館中各類密檔整理刊錄，由於多爲原檔，史料價值極爲珍貴，本文在論述第四、五兩章時，即曾大量引用^⑩。歷史研究中，史實的論述係依據史料而定，然而在蒐羅資料的過程中，曾發生下列困難：一、唐繼堯雖通曉文墨，但流傳者多爲詩詞（如「東大陸

主人言志錄」）、文電，甚少自撰之材料可供參證；二、論述唐氏的文字多半感情用事，早期唐氏當權時的論著，語多溢美；而貴州、四川等省人士則對其大肆醜詆；近年大陸史學界更把唐氏定位為地方軍閥，因此事實真相不易揭露，取證困難；三、唐繼堯雖留有日記，但迄今仍未公開，遂使論述唐氏者多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僅知事態之表徵而不知幕後的真相，因此在推究唐繼堯的政治行為及其心態時，材料實感不足。是以本文在材料的取捨與史證的推敲上，務期求其客觀公正，俾使研究的結論能近於史實，以助於對唐繼堯及其身處時代的認識。

⑩

《雲南檔案史料》創刊於一九八三年五月，這份刊物乃內部發行，外界很少看到，故彌足珍貴。雲南檔案館收藏民國以來，雲南督署、省府，以及各廳處的檔案，是研究雲南地方史的寶庫。唐繼堯督滇長達十四年，其與各方往來密電經雲南檔案館整理後，分期刊登於《雲南檔案史料》中，這些密電間或有唐氏批語，可從其中探索唐氏真意，是研究唐繼堯很好的史料。

第一章 出身與崛起

第一節 從昆明到東京

唐繼堯（一八八三—一九二七），字蕡賚，別號東大陸主人，雲南省東川府會澤縣人^①，清光緒九年七月十二日（西元一八八三年八月十四日）生。其家世代均以科名顯於鄉里^②，曾祖父元綏及祖父嘉猷，皆因勤學早逝；父親學曾，字省三，郡庠生，爲邑中名宿，曾任滇省諮詢局議員；叔學閔，爲丁酉科（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舉人。唐繼堯係家中長子，幼秉庭訓，故其詩文頗具根柢。當三、四歲時，某日其叔見有賣秧雞者，乃以「水鳥」二字令屬對，繼堯對以「雲龍」，其叔大奇之，問其故，繼堯曰：「叔謂水中有鳥，故出水

① 唐繼堯先世原爲湖北荊州人，明初有遠祖隨沐英從征入滇，官千戶職，留屯曲靖，後徙居會澤。見「會澤唐公墓表」一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頁三二三。

② 根據會澤唐氏哀榮錄記載，唐家「自到東以來，歲貢、副榜、武舉及廩增附監，指不勝數」，見佚名編，會澤唐氏哀榮錄，臺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年月，頁四九。

鳥，我以為雲中有龍，故對雲龍。」^③六歲入私塾，所讀過目成誦，若有宿慧。在校學作詩文，下筆必自己出，不屑拾他人牙慧；考試月課時，閱卷長官多器重之。每當休閒嬉戲時，有倣效軍人交鋒對壘，繼堯必充當主將；或遇事涉困難之際，唐氏則充任代表，以排難解紛。十五歲應童子試，會澤縣令陳月溪見其試卷，大為讚賞，擬列榜首，但為忌者所毀而不果；及院試，學使田某見其文奔放峭拔，乃加列榜前，補博士弟子員，並獎勵有加。^④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清廷為變法圖強，下令各省選送學生出洋留學。唐父學會以「大局艱難，家計亦漸窘迫，非有特別學識，不足以生存世界而謀一家生計」^⑤，因有意命繼堯赴昆明預選，遊學東洋。適逢滇省大吏選送留日學生，飭令各屬申送；但此時滇省風氣未開，青年學子視跋涉重洋為畏途，所以多遲疑不應。唐繼堯則慨然謂人曰：「乘長風破萬里浪，男兒壯志也，何懼焉？況負笈異邦，學成救國，正吾輩今日之責」^⑥，乃慷慨請往。東川知府周彩臣及會澤縣令王慎餘，平時即對繼堯十分賞識，於是備文申送，赴省考試。榜發獲中，唐氏遂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秋起程赴日，時年二十一歲。是年，雲南選送留日學生，包括學習陸軍的有三十人，學習師範、法政、實業等有百餘人，盛況空前。^⑦

唐繼堯在出國前，原本打算學工科；但抵達日本後，深知中國處境艱危，而「工業緩不濟急，不如學陸軍，異日庶可為國家效用」^⑧，於是改學軍事，進入東京振武學校，同學二百餘人中，以唐氏年紀最小。先是，由於清廷派赴日本學習軍事的學生，大多未具備軍事學基礎，而且又不諳日語，於是日本陸軍省乃委託成城學校代訓這批中國學生；結業後再升入日本各軍事學校就讀。後來因為中國赴日學習軍事者日多，日本陸軍省乃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